

## 漂泊的自我认同 ——从周作人再访立教大学时的新史料谈起

鸟谷 真由美

本文着眼于周作人（1885-1967）对日本的情怀，通过分析他 1941 年 4 月访问母校立教大学时的新史料，来剖析沦陷时期周作人复杂心理的一个侧面。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为避战祸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留在了日本占领的北京，结果走向了“对日协作”。然而，他在被称为“沦陷时期”的日本占领时期的思想和行为，尚未能得到较完整的呈现。以极度“非常态”的战争为发端，直至 1940 年代初被认定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日记到现在也只公开了有限的一部分，周作人沦陷期研究的不足与此不无关系。虽然最近陆续公开了 1939 年、1949 年的日记，2018 年夏天还于东京召开了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sup>1</sup>，这种动向预示着周作人研究崭新局面的到来，然而不得不说，这些研究范围有限。依笔者管见，已有的年谱和研究关于沦陷时期这一部分往往停留于暧昧不清的记述，有的地方整段脱落<sup>2</sup>。其中，对 1941 年春周作人访日活动疏漏就是显例。

不过说回来，周作人在沦陷时期本就不愿多言。这种“沉默”出于何故？恐怕是因为他十分清楚中国人在沦陷区公开表达的困难。在周作人 1938 年 2 月所作读书笔记《读〈东山谈苑〉》中引道，倪元镇遭人窘辱却始终绝口不言，有人问他理由，答曰：“一说便俗”，周作人评价说道“此语殊佳”<sup>3</sup>。也可以认为沉默是切合他反政治主义的审美观的，但鉴于沦陷区这个复杂的社会体制，沉默似乎更可以看作是为了生存下去的一种选择和态度。这也是生活在占领区的人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然而与其他人不同，周作人于1941年1月在沦陷区北京出任阁僚级别的要职。由于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以下简称教育督办），周作人变得更为引人注目，从而被置于一个与其他留京知识分子迥异的环境中。继上一年冬天前教育督办汤尔和（1878-1940）去世以后，当时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应有关方面之请，作为其继任出马。正因这一任职，他的“对日协作”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以至于在日本战败后由国民政府主持的审判中判有罪入狱。然而此时教育督办一职的就任无疑又给他强加了一重紧张感，或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状况促使他有意识地选择了沉默。这不仅模糊了周作人呈现在别人眼中的真实面貌，也不时让他自身陷入自我意识的混乱当中。即使是完全出自无意识的沉默，那至少也是这个人物为了在那个时代活下去而做出的必要行为。他正是如此在极度非日常的北京选择了沉默，将自己藏在透明的面纱后面。

生活在沦陷期的周作人究竟是抱着怎样的思想和情感在行动，关于这一疑问的先行研究有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其后日编》<sup>4</sup>。木山英雄通过对包含周作人同时代人的亲口证言在内的大量史料以及对周作人文本的分析，还原沦陷期周的思想历程。本文亦颇受该考论的启发，不过本文并非要系统考察沦陷期的周作人，而是提取他对日本的正式访问这一局部事件来加以探讨。具体来说，就是聚焦周作人1941年对母校立教大学的访问，通过分析相关新史料来厘清访问的背景及细节，由此来剖析他当时的心境。即使他依然保持着非常态中自然需要的“沉默”，但在访问抱有憧憬之念的日本时，是否也有一些心境流露的瞬间呢？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本文从周作人的公务行为中汲取出可窥见的私人一面，并从公私两面的交错部分试对他的心境作一观察。虽然这一研究尚处于调查及发展过程之中，但本文尽可能呈上现阶段已明确的事实，补上周作人研究中的一小环<sup>5</sup>。

## 一、“文人督办”的日本访问

周作人于1941年4月再访日本，这是他自1911年从东京留学回国后第三次访问日本。之前两次是私人行程，1919年是为了访问位于日向的新村，1934年是探亲。而这第三次则是因1941年1月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周作人作为“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的一员，与钱稻孙等六名成员共同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门会议，因此是兼以致其就任之礼的正式访问，与之前的访日在目的和身份上都完全不同。文学部门会议在京都与东京两处召开，整个行程为期七天。除了参加文学部门会议之外，访日前还安排好了访问两地的日本人并会餐等活动。就在即将访日的3月26日，周作人给当时住在东京有多年交情的方纪生（1908-1983）去函，信中写“遗憾恐怕无暇详谈”<sup>6</sup>。关于他在日期间的细节，已有的周作人研究资料及年谱中虽亦有若干记载，但皆语焉不详。本文中除了日本发行的新闻外，同时参照新发掘的史料，将其行程以时间顺序逐一录出（参照列【表1】）<sup>7</sup>。

日本新闻媒体在周作人来日前后，一窝蜂地报道了他的一举一动。《朝日新闻》东京版也是此时密集报道周作人的报纸之一。报道的标题有：“‘中国文学之父’来日”（1941年4月10日），“以与日本之合作教化中国：周氏谈文化维新”（同月15日），“中国文坛巨星入京”（同月15日），“周氏慰问白衣勇士”（同月17日），“日支文人‘春日清谈’：聚在周作人身边的一刻”（同月18日），“周作人氏踏上归程”（同月19日）等。而在《读卖新闻》题为“新中国文化之父 周作人氏一行今日入京”（同月15日）的报道中，还登载了他与信子夫人的双人照。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于周作人的高度关注（其中大有亲切之情）和热烈的欢迎。

日本的文化人对其日本访问亦表现出满心欢喜。4月17日在东京星之丘茶寮，由日本文笔（“Pen”）俱乐部的岛崎藤村主办，举行了围坐在周作人身边的文艺座谈会。这一场景立即就同照片一起登上了翌日发行的《朝日新闻》

东京版。据报道记述，参加者有有岛生马、菊池宽、佐藤春夫、志贺直哉、谷川彻三、丰岛与志雄、岛崎藤村、堀口大学、武者小路实笃、柳泽健、里见弴等十一位著名作家，以及除了周作人以外的钱稻孙、方纪生、尤炳圻这三名中国人。多年来将周作人作为老师追随的方纪生几年后为祝贺周作人的六十大寿，在东京编辑出版了题为《周作人先生的事》（《周作人先生のこと》光风馆、1944年）的专为周作人所作之评论集，撰稿者有一多半是当时座谈会的参会者，该书的开头部分也刊登着《朝日新闻》所载的座谈会照片<sup>8</sup>。收录文章中一大半的最初发表是在1941年，当时日本对周作人正式访日所给与的关注从此也可了解一二。

该书的撰稿者之中，还包括了从文部省调职的白井亨一（1909-1971）和加藤将之（1901-1975）这样的日本官员。大约是因为编者方纪生作为“华北驻日留学生监督”在东京牛込设有事务所，在日本官员中也能说得上话。据白井所记，周作人在出任教育督办之后，逢人便说：“我虽不得已接受了非本职工作的任命，然一旦发现有不胜任之事，我随时都做好卸任准备。”<sup>9</sup>周作人自己认为教育督办的出任“非本职”，且并未试图掩饰这一点。另一方面，占领方的日本应该也正因为了解这一点，才对周作人这样的发言视若无睹。加藤也坦率地陈述感想道：“就我而言，并未能接触到督办什么特别的政治手腕。”<sup>10</sup>他还把周作人称为“文人督办”，觉得这一存在本身就是“博人好感、令人欢喜的”<sup>11</sup>。

“文人督办”，这也是当时在日本报纸上较为常用的对周作人的称呼。正如已有研究中已有阐述的那样，在当时的沦陷区，文化被看作在个体层面上最能“动员内心”的工具，文化与政治被视为一体<sup>12</sup>。由迥异的身份组合而成的“文人督办”这个词汇，可以说正象征着这时期很复杂的时局。这个词中蕴含了周作人身份的两面性，也就是说出任教育督办的周作人，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保证。前引新闻报道的标题中，焦点也都汇聚在他的文学家而非政治家的一面上。只要稍一浏览他访日期间的行程，就能见到在逐个拜

访兴亚院、陆军及各省厅以及参拜神社、记者会见等公务活动之余，除了参加文学部门会议以外，还有参加文艺座谈会（17日）、奈良观光（13日）、热海旅行以及或许是因为意气相投而在旅途中举办的小宴（18日）。大约周作人只要处理好作为“文人督办”的走访寒暄和会议，在其余时间还是比较能够自由活动的。就这样，周作人结束了长达两周左右的日本正式访问，返回了北京。那么，访问立教大学对于周作人来说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下一节中详细阐述其访问点滴。

【表1】周作人的访日行程（1941年4月）

注：“ ”内是原文，（ ）内及※标记为笔者所加注释

7日		与东亚文化协议会评审员代表团一行乘坐日本商船阿根廷丸（あるぜんちな丸）由大连港出港
9日	上午	到达门司港 → 13:00 出港开往神户港
10日	上午	到达神户港 → 移动 → 到达京都
	正午	出席京都市长加贺谷（朝藏）举办的午宴
	下午	参拜明治天皇桃园御陵，赴京都帝国大学访问总长羽田（亨）
11日	上午 下午	参观京都帝国大学，后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于京都帝国大学）
	晚	出席京都帝国大学羽田总长举办的晚宴
12日	上午 下午	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恳亲会（于京都帝国大学）
13日	上午	9:00 与钱韬孙、“刘”、“奥田”、“小川”等乘火车赴奈良观光
	下午	参拜东大寺、春日神社
14日	上午	8:45 到达东京站，10:00 “参内记帐”后，赴大宫御所访问秩父宫 → 参拜明治神宫、靖国神社 ※下榻帝国酒店
	正午	出席文部大臣桥田（邦彦）举办的午宴（文部大臣官邸）
	下午	出席日方主办的“东亚文化协议会续编”（于学士会馆） → 16:30 在帝国酒店进行记者会见 → 17:00 出席汤尔和博士追悼会，致悼词（于学士会馆）

15日	上午	访问兴亚院文化部长松村（隼）、内阁兴亚院海军各省，访问外务文部陆军各省
	下午	访问位于神田的日华学会赤间（信义）总务部长
16日	上午	参拜汤岛圣堂 → 10：30 赴东京第一陆军病院（新宿区户山）慰问伤病军人，赠呈礼金一封
	下午	14：20 参观位于池袋的立教大学，演讲，赠呈礼金一封 → 16：00 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会（于学士会馆）
17日	上午	赴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伤病军人，赠呈礼金一封
	下午	回到东京 出席日本文笔（“Pen”）俱乐部岛崎藤村主办的座谈会（与星丘茶寮）
18日	上午	访问“田中”“勇男”等 → 11：00 与方纪生在工艺品商店购物，购买琉球酒壶 → 会见柳（宗悦？）式场（隆三郎？） → 回酒店
	下午	与“小川”同赴兴亚院访问“及川” → 与数人去车站 → 14：10 出发 → 16：30 抵达热海 ※ 下榻热海酒店
	晚	与钱稻孙一同邀赤间（信义）“奥田”宴饮 → 22：30 散会
19日		周作人一行离开东京，踏上归途
22日	晚	抵达北京

## 二、访问立教大学时的周作人

提起周作人与立教大学的关系，许多人会想到青年周作人曾在此学过希腊语一事。周作人在《学希腊文》<sup>13</sup>这篇回忆录中，记述了立教大学时期的回忆，相关研究亦已有不少<sup>14</sup>。然而据我了解，几乎没有记述或研究提及周作人此次对立教大学的访问。本节试图解读包括照片在内的一些新史料，以此厘清1941年他再访立教大学及其前后经历的来龙去脉。

4月16日下午两点多，周作人抵达立教大学。他当天上午就参拜了汤岛圣堂，又前往第一陆军医院访问，中午用餐，傍晚还要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的

会议。在这样过于紧张的行程之中，他却挤出时间来访问位于“池袋”的立教大学。关于他抵达大学时的情景，《立教学院学报》（以下统一简称为《学报》）中有“欢迎前辈 周作人氏来访本学”（〈ようこそ先輩 周作人氏本學來訪〉）这一报道，从中可略窥一二。下面是报道开头部分：

4月14日，华北教育总督办周作人氏为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而来朝（依原文：笔者注）。他在百忙留京日程中，16日特意抽空访问曾经的母校立教大学，一起度过午后片刻，致以问候并顺作视察。此日午后两点半，一辆汽车碾过碎石子路停在本校的本馆前，走下一位中国绅士，寸头，身着支那服（依原文：笔者注），带着一些大陆人特有的沉稳风貌，发光的近视眼镜后是一双略带愁容的清澈双眼，这便是周作人氏了。<sup>15</sup>

《学报》报道描写抵达大学时的周作人，简直如同描写小说主人公的登场一般。细节部分都刻画得幽默生动，从中可以读出记者对周作人的偏爱。关于《学报》，大正时期也有同名杂志出版，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1940年刊行的学报，从报名也可以推测出它的定位是学院的机关宣传报。但它同时又是学生执笔编辑，具有校内报纸的色彩，上引报道大约也是出自学生记者之手。报道在上述引文之后，细致记录了访问时的情景，包括前来迎接的远山校长与周作人互相寒暄，随即在校长室中稍作小憩，由校长陪同参观图书馆与研究室等，又横穿过校园进入预科栋311教室，受到了教室里学生们的热情出迎，在学部三年级的中村淳郎致欢迎词后进行了演讲。以往的周作人研究中从未提及过该《学报》的报道，但它作为记录了周作人访日足迹的史料值得注意。

关于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时的情景，远山郁三校长的日记也是可以参照的史料：“四月十六日 午后1PM课长会。全员出席。诸报告。周作人氏午后两点二十分来校。七里（理：笔者注）氏向导。向导至图书馆、研究室、预科，敬赠诸印刷物，在三〇一（三一：笔者注）教室以学生代表为对象，曾根预科

长主持，远山介绍，周氏致辞。其后至三点四十分于纪念馆召开欢迎茶话会。参会者约有六十五名。”<sup>16</sup>此记录与《学报》内容大致吻合。

远山日记表明周作人在立教大学停留时间约为80分钟。下午四点预定还有东亚文化协议会的理事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他真的走访了上述记载中所列举的所有地方吗？笔者这次发现了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的黑白相片共计九张，均贴在一本无题无记名的相册中，保管于立教学院资料中心<sup>17</sup>，且不清楚本来为何人所有。将这九张相片中所摄场所——查证，发现除了研究室无法判定之外，其他场所均被作为背景拍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事实上的确到过所记录的全部场所。可以推知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的行程安排十分紧凑，这也同时表明了该访问是在最后一刻才被敲定的。那么，这次访问到底是不是公务行为呢？



“前往预科的一行”(来自“其一”)



“从预科前往一号馆”(来自“其二”)

照片中有一张题为“在校长室的周作人氏”，并附有如下说明：“昭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校友周作人氏以访问母校的形式来校”。其中“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与“校友”这两种身份的并列值得注意。对立教大学而言，受到高官且出身中国的校友访问是十分荣耀的，同时也应该能够成为一种对外宣传。参加了周作人欢迎茶话会的有多达六十五人，也是因为远山校长提前发过邀请函。这一次笔者发现的史料中就有以远山校长的名义于4月14日发出的邀请函，上面写着欢迎茶话会开始时间为“两点”，而据远山日记，周作人实际抵达的时间是“两点二十分”。在附有说明为“交换名片的松下教授”这张照片中，除了周作人和松山教授之外，还能看到几位等待交换名片的参会者排成一列，其中就有当时丰岛区长池园哲太郎的身影。翻阅校友会名簿可以发现，池园也是立教大学的校友。这些史料表明，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一事确定以后，大学方面将欢迎茶话会的邀请函发给了包含校友在内的校外人士。邀请函的发出日期为“4月14日”，因此可以认为邀请函是在周作人9日到达日本后，或是14日到达东京以后才发送的。也就是说，直到周作人到达东京之前都在调整时间，他的大学访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一安排如果没有双方的共同意向特别是周作人方面的意向，是不可能成立的。



“交换名片的松下教授”（来自“其四”）  
※ 中央为松下

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时的相片之中，除了远山校长以外，还能看到经济学科的根岸由太郎、立教学院的牧师高松孝治等当时著名的教授阵容。还有一位一直站在周作人和校长旁边、手持折扇的留髭男士，很引人注目。此人正是经济学科的七理重惠讲师，在15日的远山日记中也有“七

理氏向导”的记录，由此可以推测七理熟知中国，与周作人的立教大学访问关联颇深。下一节我们就来厘清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的成行背景。

### 三、访问背景——从《远山郁三日记》及上住昇平的追忆谈起

1941年4月9日的远山日记中，记载有当天接到周作人电报一事。相关部分引用如下：

校友周作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处来电，将来朝（依原文：笔者注）致就任辞并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借此机会抽空于十六日午后两点半到校参观四十分钟。由七里（理：笔者注）和前岛（前岛洁：笔者注）氏交涉此事<sup>18</sup>。

那一通电报何时从何处发出已是无从知晓。然而周作人只要9日到达门司港时托人发出，电报就应该可以当天送达。当时，电报一般是由电报传送站以及邮局收发的。日记中提到的“七理”讲师就是七理常惠，他的确与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密切相关。查阅周作人日记可知，立教学院牧师前岛洁和七理二人在1941年之前就已经分别与周作人有过一面之缘了：七理是1934年7月在周作人夫妇旅居的东京本乡与他们见面，而前岛是1939年8月到中国时访问过北京周宅<sup>19</sup>。虽然其后似乎并未再次相会，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与周作人进行交涉的，但考虑到二人与周的首次见面都有中间人斡旋，这次的访问也很有可能通过了中间人。

另外，校友上住升平（1919-？）先生<sup>20</sup>的追忆也值得重视。他晚年接受立教学院文书馆研究员的采访，追忆大学生活时也谈到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一事。据上住回忆，当时他主持的“海外事情研究会”及其顾问七理重惠老师与周作人来访有直接的关系。研究会的前身名为“支那研究会”，而该会是1941

年以“支那语科”<sup>21</sup>预科生的上住为中心与同班同学一起设立的，其主要活动包括与校内校外的中国留学生交流。其实上住自大学入学起便开始与中国留学生交流，这大约和他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缘分深厚不无关系。后因战争阴云愈发笼罩日本，支那研究会被与美国研究会等几个研究会统一合并，改名为“海外事情研究会”，部长是松下正寿教授（1901-1986），顾问是七理重惠讲师（1887-1965）和台湾出身的陈文彬讲师（1887-1965）<sup>22</sup>。两位讲师均为汉语教师，据说熟知中国且人脉广泛。关于七理的生平，本节后半部分将有详述。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校方也开始摸索邀请周作人的方法，笔者认为直接的契机与远山校长在周作人访日前一年收到的一封寄给“立教大学学长”的公函《关于留日中国学生名簿递送委托之件》<sup>23</sup>有关。该书函以“支那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1885-1948）的名义发出，板垣向远山要求“即刻”提供立教大学曾经在籍的所有中国学生的信息。应这一要求，大学相关部门立刻制作了至当时为止曾在籍的共计12名中国留学生的一览表，记录在有大学抬头的信纸上，作为“回答”书上报。名单中居首的就是周作人。

**【姓名】周作人 / 【毕业年度】-- / 【专攻学科】-- / 【出身校】法政大学  
预科 / 【原籍】浙江省绍兴府稽日县 / 【其它参考事项】明治四十二年四  
月十日入学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退学。<sup>24</sup>**

关于此“回答”书的内容，与立教大学教务部收藏的学籍簿对照来看，例如学籍簿的“入学前”一栏中就登记有“明治四十一年（1908）七月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预科修了”，二者内容吻合<sup>25</sup>。如此一来，远山校长在周作人来日的前一年就连续接触到前岛洁的周作人印象记（见注19）与《关于留日中国学生名簿递送委托之件》，无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校友”周作人的存在。

后来，校方还得到了1940年毕业于经济学部的校友砂田重臣（1917-1990）的父亲——立宪政友会的议员砂田重政（1884-1957）的助力<sup>26</sup>。虽然目前未



1919年创立了“留学生会”（后改称为“中日亲和会”），至1965年为止一直担任会长一职。他以“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互相理解”（中日亲和会宗旨）<sup>29</sup>的观念为基础，通过多次远渡中国以及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建立了广泛的中国人脉网络。因此可以说，上住对七理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语中的。另一方面，七理在日本游走了多个大学，个人经历有不少不明之处，但似乎对中国的深深眷恋一生都未改变。

当时周作人与七理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交流，目前日记尚未全部公开，我们也无从得知。但二人都对民俗抱有强烈的关注，如果他们因为民俗这一共同话题而互相接近，也是可以理解的<sup>30</sup>。

#### 四、“公 / 私”的交错——311教室的演讲与突发的采访

周作人在简单结束校内参观后，到311教室向约200名学生代表用中文进行了演讲。虽然目前尚未找到演讲的口述记录，但前引的《学报》报道中刊载有演讲内容概要，以此作一参照可知大概<sup>31</sup>。限于篇幅关系，这里仅举出三个要点：（1）谈“筑地”和“池袋”校舍的变迁，并赞扬新校舍体现出的发展；（2）“现在为东亚抱有的信念乃是拜立教时代恩师教育所赐”；（3）“今后日支也要紧密携手为和平将来（依原文：笔者注）而努力”。

我们可以把（1）（2）理解为以寄语立教来传达因自身的留学体验而产生的对于东京的情怀，这作为面向大学生的演讲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内容。只是（2）中硬要把所谓“为东亚抱有的信念”与“立教时代接受的恩师教育”关联起来，逻辑上多少有些勉强。其实在明治末期留学立教大学预科的两年中，周作人在此学习的仅仅是希腊语。这样近似于牵强附会的说法，当是周作人考虑到时局和演讲场所的结果。话说回来，记录演讲内容的《学报》报道本身也是经过学生记者以及翻译者之手，他们的意向和顾虑也有可能影响了记录内容。这些揣测在没有见到原文的情况下都只能停留在想象的范围内，在此暂不作更

多讨论。(3)也很有可能同样是顺应时局的发言。翌年周作人回答新闻采访时,也说道:“关于日华文化的携手,我深信东亚文化在根本上是一体的,东亚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我认为教育的根本正在于此”<sup>32</sup>。这种在顺应时局的同时却又缺乏具体性的含混不清的热忱,不正表现出他政治性的欠缺吗?



周作人演讲时情状(来自“其二”)※从右往左为大学学长、预科长、周作人、翻译



“学长之介绍”(来自“其二”)

综上所述，从演讲中可以勾勒出周作人作为校友和教育督办的双重姿态。演讲使用中文，由周作人随行的“黄”姓青年秘书进行翻译。且周作人身着的“黑色支那服”指黑色“马褂”，为男性正装。从内容和形式来看，这一演讲应当是公务演讲。但在实际公开演讲时，到场的只有立教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等立教内部相关人员，没有新闻记者。这有可能是因为周作人的来访是突然决定的，在立教大学举行演讲的消息无暇通知到更多的人。然而来访两天前在帝国酒店中也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公布行程，因此有可能是当时大学对外部人员的入校作了限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周作人的311教室演讲则是只有立教相关人员在场，在算是“半公半私”的一种空间内进行的。

继续查阅《学报》还发现，周作人在更加封闭的空间内也进行了谈话。在校长府邸举办的欢迎茶话会畅谈之余，《学报》记者对周作人进行了突然采访。这一采访内容在《学报》上全文刊登。采访报道开头部分先是和演讲要点（1）几乎相同的话题，接下来记载着如下内容：

中国学生近来已平静许多，亦有能勤学之人出现，然整体上因事变而失去活力，研究也受到各种限制。我以为中国学生必须拿出更多朝气活力来。如今光景，学生的文化运动全无踪影，大学新闻等更不必说，文坛沉滞，最多仅有报上的大众小说一类，似无文学性作品出现。凡此种种问题，皆需尽早处理事变达成和平，方能得到解决。<sup>33</sup>

在接受学报记者突然采访时的发言，应该可以判断为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流露。所谓“事变”指的就是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事变，事件爆发的当时日本称之为“支那事变”。周作人以学生活动及文坛沉滞为例，述说了他对事变余波给中国文教界带来冲击的现状所抱有的忧虑。在这种担忧的背后，无疑是日本在沦陷区实行的文教政策所投下的阴影。然而导致这一发言的直接契机，恐怕除了立教大学的新校舍这一可能以外，还有在《学报》和

上住等人的“海外事情研究会”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的学生们活跃的课外活动<sup>34</sup>。或许是周作人在立教大学看到了自身理想中文教界应有的姿态。

那么，这一采访有没有翻译人员在场呢？一来这是欢迎茶话会畅谈之余的短暂间隙时进行的采访，二来校长府邸的周作人交谈相片中，均未曾出现“黄秘书”的身影，校长及其他立教大学相关人员是直接与周交谈的，因此采访报道的内容有很大可能是周作人自己直接对记者讲述的。即使周作人当时使用的是中文，立教大学也有如上住这样掌握汉语的“支那语”学科学生，会场的校长府邸相片中也的确照出了几名身着学生制服的学生身影。也就是说，采访的进行并非在完全的公务空间，而是“私人”空间。从此时周作人吐露的即兴发言中，是可以看出他基于私人意识的真实心情的。



欢迎茶话会上的集体照（来自“其四”）

访问立教大学时周作人的种种言行呈现出他的多重身份，除了有作为“文人督办”这一兼有文学家和政治家身份的一面以外，还有作为校友的一面。这

表明周作人对立教大学的访问本身就是“公”和“私”之间，即是在二者交错之中进行的。周作人访问时呈现出诸多作为校友的言行和应对，毫无疑问是两方事前就约好“以访问母校的形式来校”（“其一”说明文字）。这个提案出自哪一方已无从得知，但至少可以看出周作人是抱有一种对母校的亲近和关心之情的。若非如此，他就不会在如此高度紧张的繁忙行程中，还特意在即将来访之前还调整时间访问立教大学了。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时，虽说依然保持了“文人督办”的面目，但也充分享受了校友这个身份。

## 五、流动的“文化”想象

周作人在沦陷期究竟是如何理解文化的？作为“文人督办”的周作人所期待的“文化”是存在于政治性脉络中的，与周作人向往的文化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如前文中所示，也体现在访问立教大学之际他身上存在的数重身份之中。本节主要关注周作人访问大学时的年份，对在此前后他思想历程的一面作一概观。

从作为“文人督办”访日的前一年开始，周作人接连发表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四篇重要论文，分别是《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sup>35</sup>。从“事变”之前就自称为“原始儒家”的周作人在这四篇中，提倡向“儒家”式中国传统的回归<sup>36</sup>。

《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历来备受瞩目，皆因其后该文也多次登场，1943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以此文为由头作《打倒中国老作家》批判周作人，而周作人亦加以反驳，且在战后审判的答辩中，周作人又提及此文进行自我辩护等<sup>37</sup>。因迄今为止对其已有许多讨论，在此仅引《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一部分来窥其概要。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

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挺而走险，急将安择也。……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决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可是这又怪谁来呢？<sup>38</sup>

“别的宗教的国民”所指乃是日本人。周作人从日本民族的宗教式信仰乃至宗教感情中，发掘出了和中国人的不同之处。这篇文章发表在沦陷区的北京，因此如片冈铁兵这样的日本人站出来也完全可以理解。在此文中，周作人写的不是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共通之处，反而通过聚焦二者的本质，描绘出了其中的差异性。

而这种对于文化“本质”的关注，在之前1935年至1937年发表的四篇日本文化研究论文即所谓“日本管窥”系列中，却不见踪影。自认作“日本研究小店”的周作人在系列之初，便说好是“寓公”的“回忆与印象的一种杂谈”<sup>39</sup>，与政治和军事保持距离，单独谈论文化。在这里他主要议论的是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共通性。当时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愈发强大，在这样的局面下周作人的虚无感日渐加深。“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sup>40</sup>与自身体验和憧憬的明治东京相距太远，处于反“文化”状态的昭和日本就在眼前，此时的周作人大约感受到异文化理解也已走到尽头。于是系列最后一篇“日本管窥之四”中他便宣告了“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sup>41</sup>。

此后，身处沦陷区北京的周作人便以翻译和教学为生，然而以1939年元旦的刺客袭击事件为转折，他被剥夺了外出的自由，也无法如愿出门去授课了。这时的执笔数量自然显示出回升的趋势，在这样的北京“苦住”生活

中，发表的就是以《汉文学的传统》为首的四篇。这里周作人提出了“汉”的概念，它拥有何种意味呢？《汉文学的传统》一开头就解释了何为“汉文学”：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当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sup>42</sup>。

周作人在汉字、汉文、汉文学这种传统且极为狭小的范围内寻找出民族价值，通过语言来明确区别他者与自我，同时强调中国民族价值的确定性。如前所述，沦陷区将文化与政治视为一体，主张以文化来管制个人精神。亲眼目睹这一切景象的周作人，恐怕是在担忧中国民族的前途所向。他的意识转向了文化的本质，开始思考中国特有的“汉”之概念。或许在这其中就寄托了无需日本介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本国近代化这一理想<sup>43</sup>。即使与其他同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相比，这种通过回归传统来重生乃至实现近代化的构想也是周作人特有



“与校长欢谈”（来自“其三”）※从右往左为周作人，远山校长，七理讲师

的。除了他秉性如此之外，出任教育督办的亲身经历应当对他的主体性也有所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笔下“文化”的变迁，恰恰投射出了在时局的政治要求和基于私人意识的心境之间摇摆不定的自己。作为“文人督办”正式访问日本时，周作人正处于这一时期。

###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的史料，试对他在沦陷期的复杂思想和心绪作了几点剖析。作为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和“文人督办”访问日本的周作人，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了不同的身份。而访问立教大学时又加上了“校友”的身份，使得各种身份更为错综复杂。不知是否是因为被他称为“第二故乡”东京的春日空气缓和了生活在沦陷区的周作人紧张的心情，立教大学照片中，出现了他放松地与远山校长谈笑风生的姿态（参照本篇末尾照片）。

1941年4月22日晚，评议员一行结束了为期约两周的日本访问，返回北京。四天后周作人以旧体诗体裁作一“打油诗”，成为周作人生前未发表的《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七言绝句20首中的第六首<sup>44</sup>。

春光如梦复如烟<sup>45</sup>，  
人事匆匆又一年。  
走马看花花已老，  
斜阳满地草芊芊<sup>46</sup>。

在这首春景诗中，周作人也寄托了访日时的所见所感。对他而言，这次再访日本是如“梦”如“烟”一般短暂又虚幻的经历。在瞬息变化的时局变化之中，他扮演了“文人督办”去日本“走马看花”，但猛一醒转，花色已老，只有夕阳斜照郁郁的青草。暮春还没到初夏时节的北京，展现在由梦中醒转的周作人

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现实，景中映出了对已经结束的日本时光的怅惘眷恋之态。周作人寄托在这首诗中的的是对日本的怀念，此刻心绪化为心象风景，与现实中的季节风物在诗中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此诗中也语含讽刺。“走马看花”取的是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典故。周作人除了作为“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出席会议之外，还作为教育督办与日本官员挨逐个寒暄，完成了一个官僚的任务。在学士馆的汤尔和追悼会上他还致以悼词，说对于汤出任阁僚时时敬慕<sup>47</sup>。当然，把这种官方场合的政治性致辞认作周作人的真实想法是过于草率的，但他自身固有的自负也隐约流露其中。然而诗中呈现出的形象却反而是无法遂心如愿，有些不如意的，从中不正能看出周作人的悲哀吗？时光匆匆不待人，世间万物都按照大自然的规律生长衰败。花已枯萎，草却萋萋，枯荣对照，正象征了人世间的一盛一衰。或许周作人用“花”暗示了自己浮云幻影般的身份，至少这种盛衰是他所不愿见到的，带有自嘲的意味<sup>48</sup>。

在沦陷区北京就任伪职的周作人选择了“沉默”。这当然可说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然而在他就任之时，如他这般博学广识之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决断的严重性，尚且值得追问。从访日时多重身份的轮转之中，特别是从访问立教大学时“公/私”的交错之中，似乎得以寻找出他主体性的“摇摆”。而这种“摇摆”在当时，与他的意识转向文化本质这种更为内部的东西在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步步陷入“对日协作”的周作人显得决意不明且捉摸不透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木山英雄先生指出，“他用‘东洋人的悲哀’去唱和‘大东亚共荣’的高呼，这种讽刺必定也洋溢在他‘协作’的言辞中。”<sup>49</sup>周作人本质上是个讽刺家。因此他在极度非常态的北京度日，一味“沉默”之中将基于私人意识的心情嵌入打油诗中，这似乎可以说简直是必然之举<sup>50</sup>。因此有必要考察周作人在整个沦陷期所作的打油诗，此课留作今后另辟一文讨论。



“与校长欢谈”（来自“其三”）



“于校长室的周作人氏”（来自“其一”）

【本文原于2019年3月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的《中国21》第50号（173-196页）中发表，透过祝世洁女士的协助，拙文中文版登载在于《北九州市立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153号。】※本稿の初出は『中国21』第50号（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編、2019年3月、鳥谷まゆみ『漂泊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周作人の立教大学訪問時における新史料から』173 - 196頁）である。祝世潔氏の協力のもと中国語に翻訳して本誌に掲載した。

<sup>1</sup> “第一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7月7-8日在早稻田大学召开。本文以该研讨会及“围绕中国近代的知识经验及文学国际研讨会（爱知大学，2018年7月15日）上的口头报告和会议用论文为基础，并加以大幅修订后定稿。

<sup>2</sup> 如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

- <sup>3</sup> 药堂《读〈东山谈苑〉》（1938年2月20日作，《晨报》1938年6月24日。收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9页）。笔者在日语稿中给“俗”一字注音为“やぼ”，是因为周作人在给武者小路实笃的公开往返书简（《读卖新闻》1941年6月21日）中提及此文，将“俗”解释为“野暮（やぼ）のこと”。周作人在1943年题为《辩解》的文章中也再次收录了包含此句在内的该文全文。以上出自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其后日编》（《周作人〈对日協力〉の顛末 補注《北京苦住庵記》ならびに後日編》岩波书店，2004年，85-86页）。
- <sup>4</sup> 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其后日编》，同前注3。
- <sup>5</sup> 关于发现新史料的原委，笔者在此略记数笔。2017年初冬，笔者赴立教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百年风华——华文文学与文化”）作报告，而同场的铃木勇一郎先生（立教学院史资料中心）的报告之中，展示了周作人访问立教大学时的两三张老照片。笔者对此骤然发生了兴趣，便在铃木先生以及宫川英一先生（立教学院史资料中心）的鼎力相助下，开始在立教大学调查，竟然找到了另外几张照片和一些有关记录，真是意外之喜。关于《立教学院学报》等也承蒙二位多予赐教。在此谨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 <sup>6</sup> 方纪生《周先生の点点滴滴》（《大陸》1941年5月号，改造社最初发表。收入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のこと》光风馆，1944年，221页）。
- <sup>7</sup> 1941年的周作人日记目前尚未公开。笔者在周作人国际研讨会上进行口头报告（见注1）时，获得了一位中国研究者提供的一小部分有关周作人逗留日本期间日记的史料。据说曾有一段时期能在鲁迅博物馆中见到周作人日记的全文。本旅程表的制作也参照了那次获得的相关史料。
- <sup>8</sup> 关于该书，参照川边比奈、鳥谷まゆみ《方紀生のこと——《周作人先生のこと》編集と日中文化交流に捧げたその生涯》（中国文艺研究会编《野草》第98号“周作人特辑号”，2016年10月，64-102页）。

- <sup>9</sup> 白井亨一《雅俗両道——教育総署の周先生》（初出不详，《周作人先生のこと》见注6，154页）。
- <sup>10</sup> 加藤将之《督辨としての周先生》（《周作人先生のこと》见注6，147页）。该文应该是以《華北の風物文化》（山雅房，1943年）中所收两篇《華北教育事情と興亜読本》《華北の役所風景》为底本，特意为《周作人先生のこと》一书新撰的。
- <sup>11</sup> 加藤将之《督辨としての周先生》（同上，148页）。
- <sup>12</sup> 川島真《華北における〈文化〉政策と日本の位相》（平野健一郎编《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东洋文库，2007年，61-85页）。当时，周作人也用日语谈论过“日华文化的提携”，分别是《中国文学の動向——日華文化の提携について（上）》以及《文化の根底は——日華文化の提携について（下）》，登载于《朝日新闻》“东京版”1942年3月18日、19日。此两篇其后被改编合为一篇，改题为《日華文化の提携と中国文学の動向》，收入《周作人先生のこと》（见注6，243-246页）。关于沦陷区的文教政策，可参照兴亚院北支联络部《北支に於ける文教の現状》（兴亚院北支联络部发行，1941年），以及朝比奈策太郎《北支に於ける文教問題》（三秀社，1941年）。其他先行研究还有小野美里的《日中戦争期華北占領地における文教政策の展開——〈事変〉下占領地の〈内面指導〉》（首都大学东京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 <sup>13</sup> 《学希腊文》（《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84-386页）。
- <sup>14</sup> 代表性的相关研究可参考：根岸宗一郎《周作人与H・S・タッカー——立教大学におけるギリシア語学習とギリシア文学・キリスト教との出会い》（《中国研究月報》第55卷4号，2001年，20-29页），以及波多野真矢《周作人与立教大学》（《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41-45页）。
- <sup>15</sup> 《ようこそ先輩 周作人氏本学来訪》（《立教学院学报》7卷7号，1941年5月6日）。
- <sup>16</sup> 奈須恵子、永井均等编《遠山郁三日誌 1940-1943年》（山川出版社，2013年，

118-119 页)。远山郁三(1877-1951)是日本皮肤科学者,历任东北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授,其后自1937年4月至1942年2月任立教大学校长。参阅海老泽有道编《立教学院百年史》(立教学院,1974年)。

<sup>17</sup> 发现的相片分类为“其一”至“其四”,被贴在一本相册中。各分类标题如下:“其一”为“昭和16年4月16日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督办校友周作人氏 以访问母校形式来校”(两张)，“其二”为“预科第311号教室 周氏之演讲”(三张)，“其三”为“于校长纪念馆草坪上”(两张)，“其四”无标题(两张)。以上共计九张。

<sup>18</sup> 《遠山郁三日誌 1940-1943年》(见注16, 117页)。

<sup>19</sup> 参见《周作人日记 下》(大象出版社,1998年,649页)、《周作人1939年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29页),以及前岛潔《周作人氏に會ふの記》(《立教学院学报》6卷1号“随笔”栏,1940年1月28日)。据前岛回忆,他1939年夏天去中国视察旅行,访问北京的崇贞学园时,在园长清水安三的建议下访问了立教校友周作人。

<sup>20</sup> 校友上住升平1919年生于大阪,不久随父亲工作移居“奉天”,后来又迁居上海。小学二年级时回到神户。中学二年级时编入旅顺中学,又入“大连高商”一年。此后,1938年进入立教大学预科商科,1944年毕业于本科经济学部。即将本科毕业时于1943年9月以“海军预备学生”的身份派到旅顺。以上,参见永井均采访、山中一弘编《インタビュー 学生生活と戦争 上住昇平さん(昭一九卒)に聞く》(《立教学院史研究》第4号,2006年,126-149页)。

<sup>21</sup> 支那语学科开设于1938年,是属于预科的第三个学科,前有德语科和法语科两种。开科时学生人数共38名。

<sup>22</sup> 在《立教学院学报》5卷秋季号(1939年11月30日“校报/大学部/辞令”和“新任教职员住所”一栏)中,可以看到七理和陈的姓名和地址。

<sup>23</sup> 参见立教大学收藏《留日中国学生名簿送付方依頼ノ件》(1940年11月20日,“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行)。1940年左右,调查全国高等学校留学生在籍情况主要是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进行(如《満州国並支那留学生在籍者ニ関スル件》

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三谷隆信发行)。然而对于立教大学，是特别由支那派遣军发出调查委托书来询问的。

<sup>24</sup> 立教大学收藏《留日中国学生名簿送付方依頼ノ件回答》(1940年11月29日，“立教大学长远山郁三”发行)。该回答书上有补记“在學生ニハ該當者無之候”(在校中无中国留学生)一文。

<sup>25</sup> 周作人的成绩单目前未公开。本稿参照了波多野真矢《周作人与立教大学》(见注14)中所载画像。

<sup>26</sup> 永井均采访、山中一弘编《インタビュー 学生生活と戦争 上住昇平さん(昭一九卒)に聞く》(见注20, 141页)。

<sup>27</sup> 中井寿孝编《歌碑建立記念 文学と中日親善に生きた七理重恵先生をたたえて》(七理重恵先生显彰会柴田修吉发行, 1983年)。关于七理氏, 可参阅兵库县新温泉町的网页, 其中有七理的介绍文和他的照片。有关七理的先行研究不多, 代表论文有中村みどり《七理重恵と中国民謡——『同仁』を中心に》和《七理重恵と中国民謡(続)》(《中国民謡通信》第89号、2009年2-10页, 以及第99号、2011年2-8页)。中村在其中指出, 七理与“东亚研究会”(设立于1925年)、“中国文学研究会”(设立于1934年)有直接联系。七理于1940年前后发表的“东亚文化研究讲座”丛书著作均由东亚研究会出版。据《中国文学月報》14号(1936年)的“会员录 4月10日现在”和19号(1936年)“会员调动”栏目中能够看到七理的名字。他参加过第5回例会(见1935年第3号“会报”), 以及第2回座谈会(见1935年第4号“会报”), 参会者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

<sup>28</sup> 七理收集的民谣中除了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民谣以外, 还包括书籍中的民谣。据《自序》记录, 原本钟敬文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文》, 但“因篇幅有限而不得已割爱”。该书封面画由上海画家王廷珩所绘。以上来自七理重恵《支那民謡とその国民性》(明治书院, 1938年)。

<sup>29</sup> 《中日親和会の趣旨を——創立三十五周年を迎えて》载于《七理重恵先生をたたえて》同注27, 122页。

- <sup>30</sup> 七理曾两次接受外务省的研究补助金在中国实施民谣收集调查（昭和10年、13年）。“目的乃是为了汉文学研究，主要于中部南部支那采集民谣俗谣，开明（依原文）其与诗经之关系，并加以民俗学考察及社会学研究，判定其在汉文学中地位”（目的漢文学研究ノ為メ、主トシテ、中部南部支那ニ於ケル民謡里謡ヲ採集シ、コレガ詩経トノ關係ヲ開明シ、併セテ民俗学的考察ト社会学的研究ヲ加ヘ、漢文学ニ於ケル其地位ヲ判定セントス）（昭和10年6月分）。以上见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本邦人滿支視察旅行關係雜件 / 補助實施關係第十卷》。关于周作人的民俗，参照子安加余子《日本占领下北京における周作人——「対日協力」と民俗を語ること——》（斎藤道彦编《中国への多角的アプローチⅢ》，中央大学出版社，2014年，233-248页）。
- <sup>31</sup> 《ようこそ先輩 周作人氏本学来訪》（见注15），以及《周作人氏母校立教大学を訪問す》（《基督教週報》第81卷16号，1941年4月25日）。
- <sup>32</sup> 《朝日新闻》“东京版”1942年3月18日（见注12）。
- <sup>33</sup> 《ようこそ先輩 周作人氏本学来訪》（见注15）。
- <sup>34</sup> 在此约一个月前，周作人回答日方汉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道：“关于中国整体的教育问题等，如今国内情势亦如君所知，殊非可谈之时”（秀华《周作人先生访问记》，《华文大阪每日》1941年3月15日）。另外，他于该年2月在“伪”北京大学文学院以“国文教员的资格”为题，同样是面向学生进行了演讲。知堂《怎样研究中国文学》1941年2月1日刊《中国文艺》第3卷6期（《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53-557页）。
- <sup>35</sup> 四篇的最初发表时间如下：知堂《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3月27日作，1940年5月1日《中国文艺》第2卷3期），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1942年11月18日作，1943年1月《中和月刊》第4卷1期），周作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年4月13日南京大学演讲，1943年7月《艺文杂志》第1卷1期），药堂《汉文学的前途》（1943年7月20日作，1943年9月《艺文杂志》第1卷3期）。
- <sup>36</sup> 《“反动老作家”2》（《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776页）。周作人还说，“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文章，较为重要的有着四篇。”见《“反动老作家”1》（《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同上，762页）。

<sup>37</sup> 益井康一《裁かれる汪政権——中国漢奸裁判秘録》（植村书店，1948年）。笔者并未看到原文，参照的是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協力〉の顛末》（见注3，294页）。

<sup>38</sup> 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最初发表时间见注35）（《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12-713页）。

<sup>39</sup> 知堂《日本管窥》1935年5月13日刊《国闻周报》12卷18期（《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89页），以及知堂《日本管窥之二》1935年6月24日刊《国闻周报》12卷24期（《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同上，666页）。

<sup>40</sup> 知堂《日本管窥之三》1936年1月1日《国闻周报》13卷1期（《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6页）。见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協力」の顛末》（见注3，193页）。

<sup>41</sup> 知堂《日本管窥之四》1937年6月28日《国闻周报》14卷25期。还可以参阅《日本管窥》载于《知堂回想录》。

<sup>42</sup> 知堂《汉文学的传统》（见注35，《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07页）。

<sup>43</sup> 木山先生指出：“将他一步步牵引至此的，是寄托在通过复古的重生这一构想中的，由中国自行完成近代化的理想。”（木山英雄《周作人〈对日協力〉の顛末》见注3，407页。）

<sup>44</sup> 周作人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至1945年之间，共作打油诗44首，其中《苦茶庵打油诗》收24首（后收入《立春以前》），《苦茶庵打油诗补遗》收20首。

<sup>45</sup>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有“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此句袭李白句。

<sup>46</sup> 王仲三笺注《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5年，33页）。

- <sup>47</sup> 姜德明《周作人谈汤尔和——关于周作人的两篇佚文》《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41-43页。
- <sup>48</sup> 他后来回忆任教育督办的两年，说是“演戏两年”，如丑角一般。见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文汇报》，1946年9月2日。收入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 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270页）。
- <sup>49</sup> 木山英雄《周作人と日本》1973年7月，载于木山英雄译《日本談義集》，东洋文库，2002年，384页。
- <sup>50</sup> 《从不说话到说话》（《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55页）。

